

【思想文化】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 教育问题和现代意义

陈 战 峰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发现和公布为世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汉初社会。简文中的《史律》集中反映了当时对史、卜、祝的教育、考核、任用制度。先秦时期,这些人既有一定的具体的社会职能,又担负着思想文化的记录和整理任务,是传统文化典籍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之一;汉初,虽已有所侧重调整,但整体格局未变,可以使人看到古代职业教育的片段。反思他们的教育形式和思想,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 史律; 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2-0001-03

Question and importance of the education in The Laws of the Second Year in Zhangjiashan Han bamboo slips

CHEN Zhan-f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 new society of the first West-Han dynasty is discovered because of the finding and declaring of The Laws of the Second Year in the Han bamboo slips of Zhangjiashan. One of them is The Law of Historian (Shi), which reflects how to educate, test and appoint the special persons such as Shi, Bu, Zhu. In Pre-Qin dynasty, they dealt with some social works, in addition, they recorded and coordinated the thoughts and civilization, so that they were one of the creator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first West-Han dynasty, this condition was not changed on the whole. The review of their education will have advantages to our r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in all kinds of education, even in special education.

Key words: Han bamboo slips of Zhangjiashan; The Laws of the Second Year; The Law of Historian(Shi); education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787枚,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谏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涉及西汉早期律令、司法、医学、数学、军事理论等领域,对于研究西汉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学术价值。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分批整理和公布这些竹简照片和释文,

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持续十余年之久,无论是在广度与深度上都促进了秦汉之际和汉初社会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01年底,《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1]全文公布,顿时再次掀起学术界研究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热潮,至今依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围绕《二年律令》,不少问题的研究在不断的细化和

深化。总之,竹简的面世,使我们有幸看到一个新鲜的汉初社会,如果从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算起直至吕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也就是二十年的时间,这段历史人们还了解的比较少,以往的历史教材叙述的也相当简略,已有的文献资料多语焉不详。因此,《二年律令》在文献学上弥足珍贵,是研究秦汉之际和汉初社会的权威资料,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展开分别的和综合的研究。现在研究者涉及的比较多的是汉代法律及其沿革,汉初政治、经济、社会(包括职官、区域建制、通信制度、津关管理、传食规定等)等领域。教育也是社会活动和文化方式的重要内容,那么,《二年律令》中有没有教育问题呢?

一、《史律》和“史”、“卜”、“祝”的文化贡献

实际上,《二年律令》有专门涉及教育的部分,只是占的份量比较少,而且教育对象又比较特殊,往往不被人重视,这就是《史律》^[1]。

《史律》已发现和公布的共有十三枚竹简,简文内容是对“史”、“卜”、“祝”几类人的教育、考核和任用规定,几乎近似于今天的教育大纲或条例,不过范围较窄罢了。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下意识地会对“卜”、“祝”等人产生某种排斥性,认为那是科技和理性不发达时代的角色,连带上有光环的“史”也不容易被理解。事实上,了解古代典籍的人们知道,古代文化和智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系统化、文字化的过程,而这些工作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些人完成的,早期社会尤为明显。不仅如此,从精神文明的起源角度看,“这些精通仪式和制度的‘祝’、‘史’、‘宗’、‘巫’,在操作中就成了后来被称作巫者或术士的角色,在解释中就成了后来被称作知识人或思想家的角色,而这些被仪式和制度确认、又被人们悬置起来的观念性内涵,就成了‘普遍真理’,从这些真理的不同解释中引申出来的很多思想话题,就可能成为思想史的资源”^[2]。因此,他们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传承者、整理者和创造者,为传统社会的文明和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如果结合一些不朽的文化典籍,就更能体会到“史”、“卜”、“祝”的伟大工作,也就更容易理解《二年律令》列入《史律》的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

首先,《周易》就是一部占卜资料的汇编,直接就是“卜”人的劳动记录,起初是零乱的材料和占卜的资料档案,渐渐地在整理中有了一些眉目,经过战国至秦汉间人的注释阐发(即《易大传》或简称《易

传》),凝聚为独标阴阳相推、刚强不息的理论体系,被尊为经书,历代学者不断钻研,形成今日依然兴旺的“易学”,没有“卜”的努力,这门学问的产生甚至都成问题。众所周知的老子和孔子也和“史”有一定关系。老子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三个都可以被以“老子”称呼的人中,西周末年做掌管书籍资料的“史”的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老子申韩列传》)^[3]最有可能和条件写出《道德经》一书,纵览古今,历经沧桑,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上熔铸出充满智慧的五千言。孔子晚年删订《诗》《书》(宋以后引起人们的怀疑以至今已基本成为定论,孔子删诗的传统说法已被否定),作《春秋》,后者就是鲁国的史书,孔子也充当着一些“史”的角色。先秦的一些“儒者”经常来往于婚丧嫁娶间,作宾相赞礼,相当于现在的“司仪”,与“祝”就有些瓜葛,他们的经验累积而成为《礼》书。古代的《尚书》,虽然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已不值一辨,但它记载了所谓三代的一些文诰,自然免不了和“史”的关系。最后,即使今天称作《诗经》的《诗》,当时也不是仅供诵读的“徒歌”,而是演奏的乐曲和“乐歌”,经过懂音乐的太师的整理^[4]，“史”“卜”“祝”“师”往往并称,可见近乎一类人了,“师”是音乐方面的专家,能辨别出音乐的节奏和情感,毁于秦火的《乐》书大概也经过他们的手。“六经”和《老子》等,这些中国思想文化的源泉都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可见,这些人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及凝结着他们辛劳的文化和典籍都值得我们后人尊敬。

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汉初社会“史”“卜”“祝”的重要职能,他们不仅仅参与了某些具体的社会活动,更重要的是掌握着当时的思想文化,享有一定的文化阐释权利。《史律》反映秦至汉初的社会现实状况,甚至保存着不少先秦的资料和消息,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当时学者的成长方式和历程。

二、《史律》所涉及的教育问题

前文主要涉及竹简《史律》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在对比中给他们一些同情和理解,有助于把握那些不容易被注意的因素。

据笔者分析,《史律》尽管内容不多,但触及的相关教育问题并不少,约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童的来源。简文把那些有条件接受教育的青年称作“学童”。律令对学童的来源与入学的年龄有明确的规定:“史、卜子年十七岁学”(简 474)。这里,一方面规定了学童有组织的学习时间始于十七岁,与古籍记载大体相合,“学童十七以上,始试,

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3]。另一方面规定了教育对象是“史”与“卜”的儿子,这在当时被称为“畴官之学”,即家族世代相传的学问,实际上,汉承秦律,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中已有明确规定,“非史子毆(也),无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6],学室据上下文判断应作为一种学校,可能是固定的教学场所。《史记·历书》、《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7],《二年律令》的另一种律《傅律》也有类似的规定,“畴官各从其父学,有学师者学之”(简365),但未明确被傅为畴官的具体年龄。在被定为畴官的时间细节上,出土简文与史料记载略有出入;简文对畴官从学的途径规定的比较灵活,不一定要从父学,也可以跟上自己的老师学,与史书也不甚一致。这些都是简文发现所引起的新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司马谈父子、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体现了这种家业相承、学术相承的特点,而且往往父亲临终时都有一定的史学任务交代,使史学发展绵延不断。

二是考试和任用。如何检验和体现学童学习的效果,当时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三年期满,即要参加八月初一举行的考试,考察有各自的范围和特点,但不外乎讽诵典籍和实践技能两个方面。史因主要任务是“记事”(《说文解字·史部》)^[5],对文字要求很高,“史”类学童要讽诵“十五篇”,《汉书·艺文志》作“《史籀》十五篇”,“《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7],其中透露的先秦消息已不言而喻;还要演示自秦以来流行的八种书体,《说文解字·叙》载“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5],太史裁断后,取最优秀的担任县令史,最末的不授予史职,每三年再进行一次综合考察,成绩优秀者担任尚书卒史。“卜”类学童要讽诵史书三千字,能引用卜书三千字,如果在九次占卜中,能卜对七次才可以担任卜职。“祝”类学童测试内容为“十四篇”,要能讽诵七千字以上,才可以担任祝五更(疑为祝的一个级别),太祝还要以一些具体的事宜来考察,可以成为“冗祝”。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凡“不入史、卜、祝者,罚金四两,学俱二两”(简480),对那些考察不通过者,既要罚本人,还要罚辅导者(即学俱),这是一种略呈粗暴但不见得无效的刺激性措施。

最后是学童的管理。有两点特别鲜明,“谒任史、卜,上计修法。谒任卜学童,令外学者,许之”,“学俱敢擅徭使史、卜、祝学童者,罚金四两”(简

484)。前者给学童留有一定的自由,如因学习需要而外出拜访,是被允许的,古代的历史工作者能遍走天下,寻访遗迹和旧闻,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后者强调要保证学童的学习时间,禁止学俱役使学童。

整体上,《史律》依然很简明扼要,有相当强的操作性和约束力。

三、《史律》教育问题的现代意义

综上所述,如果排除掉《史律》中的一些时代印痕和教育对象特殊性等因素,在一般意义上仍有不少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的地方。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 教育对象选择上很注重学生的成长氛围

尽管这些简文中没有“因材施教”之类的词语,但这种思想却通过考察学生的成长环境间接地体现了出来。今天,尤其是职业特色较强的学科,做一些成长环境、个人兴趣、心理素质、发展潜能等方面的考察和测量很重要,也很必要,在现实教育中不少有识之士已进行了积极尝试和实践。当然,现代社会强调学习的平等性和学生的自主性,在职业教育亟需加强的今天,这个思路也许不乏借鉴意义,能体现人力资源和知识的最大整合和承继。

2. 考察内容上知识和技能并重

讽和诵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许慎对二者未作区分,段玉裁作注时引用《周礼·大司乐》郑玄注作“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说文解字注》三篇上)^[3],诵和记忆背诵差不多,而讽则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的意思,不纯粹是死记硬背。此外,“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籀书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九千字之多”(《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3],所学和所能一致,使他们的考察体现出知识和能力的一致性,少有今天的高分低能和所学非所用的教训,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考察标准的数量化和明确性也是《史律》的特点,这和今天的量化考核相似,至少让我们明白古人也有这种传统。

3. 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相对自由

在现代社会中,像他们那种出外访学方式已不可能大规模提倡,不仅时代特点不同,而且今天的人们有更多更快更准确收集资料的方式和途径,但“行万里路”、亲自实地考察并非没有借鉴意义。教师或辅导者不役使学童,可以给教育工作者以启发,杜绝

(下转第18页)

政府要求政府创新其服务方式,使服务更为快捷、更为方便、更为畅通、更为直接、更为公平,政府服务将朝“单一窗口”、“跨机关”、“24 小时”、“自助式”的方向发展^[15]。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世界,为了更好地参与竞争与合作,我们需要一个有限的、有效的、透明的、法治的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高效率的服务。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建设学习型政府,形成公共管理的新理念。通过组织学习,推动政府不断创新,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示范作用和表率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 [2] 何吉成.知识经济:21 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J].人大复印资料,1998(2).
- [3] 崔绪治.知识经济三论[J].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4).
- [4]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 [5] 张声雄.学习型组织的时代意义及在中国的发展[J].未来与发展,1995(5).
- [6]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 郭 驰,闫鹤翔.学习管理:推进行政性组织成长的新途径[J].中国行政管理,2002,(3).
- [8] 王 虹.创建学习型组织之管见[J].管理科学,2000(1).
- [9] 张晓霞.创建学习型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性工程[N].人民日报,2003-03-27(9).
- [10]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领导红皮书[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
- [11] 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2] 马太军.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J].国外社会科学,1997,(5).
- [13] 张康之.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J].行政论坛,2000(4).
- [14] 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15] 张传军.知识管理与行政组织创新[J].人大复印资料,2000(5).

[责任编辑 陈志和]

(上接第 3 页)

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陋习。同时,不合理的重复也是浪费学生学习时间、降低教育效率的原因,而且是变相役使学生的表现,也可以从这里获得克服的思路。

总之,传统文献资料不仅昭示了那个特定的时代,而且能给今人以更多的启迪。借鉴和吸收固有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已是刻不容缓的了,在教育问题上也是如此。我国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多受西方的影响,这种借鉴的思路至今不衰。现代教育建基于分科教学之上,是西方刺激和启迪的产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分科教学以分析性、明确性、系统性见长,是系统论和控制论思想和方法的体现,随着“非控制论”声音的增大,人们发现有不少更深层次的东西已被遗漏和肢解了。近年来不少著名学者奔走呼吁“人文教育”,不少院校开设了传统文化课程,研究机构日渐增多,中学语文教材的改革也注重了文化性,这已是可贵的进步,但文化典籍和课程依然

是理性分析的对象,是作为冰冷的知识体系来讲解和接受的,不过是众多分支学科的一个而已。这里面的经验教训是有待我们认真思索的。传统教育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一些有普适性意义的思想值得我们今人借鉴和反思。

参考文献:

- [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 洪湛侯.诗经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5] 许 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 [7] 班 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杨彬智]